

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面貌及发展态势

王记录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存在着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三种形态。主流史学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构建起来的史学话语体系,表达的是国家的历史观;精英史学侧重于追求学术价值的永恒和理论创造的精深,表达的是个性化的历史见解和审美情趣;大众史学则是由大众书写、通过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提供给大众阅读的史学。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的发展态势是主流史学面临考验,精英史学不断崛起,大众史学异军突起。要建设更加健康的史学生态环境,主流史学必须以更加开阔的胸襟迎接各类史学的挑战,走向新的繁荣;精英史学要有更多的社会担当和政治关怀,彰显社会良知;大众史学则必须提高书写者的学识修养和社会责任感,使作品达到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关键词: 改革开放;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大众史学

中图分类号: K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13)04-0108-05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其存在形态怎样?又该怎样认识这种存在?这是史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笔者以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演化为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三大史学形态,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建了当代中国史学的基本面貌。

划分史学形态可以有多种方法,依据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笔者侧重于从历史书写的目的性来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的存在形态,并把外在的表达方式和写作风格作为参照。由此入手,笔者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划分为内涵和特质各不相同但又又有密切联系的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三种形态。

主流史学(或称主导史学)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建构起来的史学话语体系。用现今流行的话说,主流史学的基调是弘扬

“主旋律”,其目的是以维护国家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为主,研究历史是为了说明现行政权的合法性,表达的是统治者的历史话语。或者说,统治者通过主流史学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并把对历史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主导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从而形成全民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主流史学往往和权力结盟,具有强烈的政治关怀意识,可以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学术资源自上而下地向人们灌输某种历史观念,“建立一种‘政治—学术’模式,即通过历史研究这样的学术性行为来隐蔽地表达政治意图,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使史学能够更好地为现行政治服务”^{[1]159}。主流史学在中国当下的具体语境中显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在中国,这个体系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封闭到开放、由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立到对话的发展过程,并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中国史学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以来,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史学中的优秀的思想遗产和历史进程相结合,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收稿日期:2013-01-29

作者简介:王记录(1964—),男,河南范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学成为当今中国史学的主流。这个主流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在历史观上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在研究风格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从世界范围来看,这可以说是当代历史学的中国学派”^[2]。

所谓精英史学,学界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从记述内容的角度来理解,指那种反映“精英人物”的政治、军事活动的史学;一种是从撰述主体的角度来理解,指由“精英”撰述的史学,也即知识分子撰述、传播和分享的史学。我们所讨论的精英史学,是“精英”撰述的史学。中国语境下的“精英”是指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才,精英史学自然是指作为知识分子一部分的优秀的历史学家所创作的历史作品及其史学旨趣。从目的性上讲,精英史学侧重于知识阶层的历史表达,自觉承担着社会教化、批判和启蒙的使命,是“经典”的解释者和传播者。在史学思想上,精英史学宣扬一种普遍的社会理想,传播文明,鞭挞丑恶,弘扬历史正义,阐扬向上的人生信念,对人类的生存怀有忧患。在学术价值上,精英史学追求学术价值的永恒和理论创造的精深,致力于学术的原创、承继和发展。在历史书写的态度上,体现的是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表达的是个性化的历史见解和审美情趣,对历史和现实都葆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精英史家秉承“秉笔直书”和“求真致用”的理想,以国家民族为担当,启迪民智,传承文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方面,在吸收西方优秀文化为我所用方面,在构筑不同的历史研究范式方面,都卓有建树。

在当代中国,“大众史学”又常常被称为“通俗史学”、“公众史学”或“公共史学”。“通俗史学”一词源于中国本土,即运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枯燥无味的历史知识描述得富有趣味,便于民众理解和接受,从而达到普及历史知识的目的。“大众史学”、“公众史学”和“公共史学”这三个词都源自于美国的“Public History”。台湾学者周樑楷这样定义“大众史学”：“大众史学一方面以同情了解的心态,肯定每个人的历史表述,另一方面也鼓励人人‘书写’历史,并且‘书写’大众的历史供给大众阅读。”^[3]²⁷很明显,大众史学的书写主体是大众,其服务主体也是大众,书写的又是大众关注的历史。大众史学凸显了“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的观念,打破了职业史学家垄断历史写作的局面,是一种由大众站在个人立场上,通过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话语系统,描述大众自身或大众感兴趣的历史,并提供给大众阅读的史学形态。这种史学形态注重流行和实用,突出历史书写者的个人立场和个性化,侧重于民众

自我历史思想的宣泄和表达,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在当代中国,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大众史学的书写恰恰体现了这种特点,其创作者已经不单单是职业的历史学家,更多的是其他领域的人员。他们从平民化和人性化的角度切入,打捞历史的碎片和细节,采用文学化的演绎和表达,通过各种传播媒体,把纷繁复杂的历史描写或讲述出来,激发了人们的阅读或倾听兴趣,在普通民众中广受欢迎。^[4]

对三种史学形态作出划分,并不认为三者之间界限截然分明。事实上,三种史学形态的交融也是明显的。意识形态化的主流史学同样存在着精英史学的因素,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启发性,亦重视学术的承继与发展;以阐扬学术为主的精英史学也同样包含一定程度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以普及历史知识为目的的大众史学也同样渗透有主流史学和精英史学的因素。三种史学形态在相当程度上和范围内相互交融和杂糅,具有某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就目前来讲,其创作主体也大都都是精英知识分子。我们只是因其主要目的各有侧重和主导倾向的各有不同而把它们相对区分开来,目的也仅仅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内涵和表征,为我们判断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当代中国史学复杂多元、繁复变化的表现形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

作为三种主要史学形态,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建构起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生态语境和价值体系标准。由于三种史学形态在研究目的、思维范式、内涵外延等方面存在差异,将三者置于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发展的整体性界域中进行考察,会发现三者之间相互竞争和借鉴,动态发展,共同描绘了当下中国史学多姿多彩的图画,促进了史学的繁荣。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史学的总体特征是主流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史坛,从各个方面支配着精英史学和通俗史学。林甘泉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我国人民思想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新中国史学的主流。”^[5]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体特征是主流史学面临考验,精英史学不断崛起,通俗史学异军突起,逐步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出现了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三足鼎立的局面。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步增强。“历

史研究工作者作为敏感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群体,自主性、独立性也逐步地并显著地增强了,而且带有创造文化的知识分子的特性”^[6]蒋大椿序。在这样的背景下,史学界开始对以往长期教条、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做法进行反思,并积极探寻史学发展之路。20世纪80年代,正本清源,重新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成为最重要的史学潮流之一。经过热烈讨论,“人们在史学理论上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历史学应该建立自己的学科专业理论”^[7]86-87。显而易见,史学研究者认识到中国史学要想取得长足进步,必须自觉摆脱意识形态化,还其学术研究的本来面目。在这样的潮流之下,历史研究领域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逐步消解,学术话语体系逐步建立。话语体系的逐步改变使主流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悄然发生了改变,虽然这一时期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还没有显示出自己的学术个性,无法与主流史学分庭抗礼,但三大史学形态开始分化的迹象已初露端倪。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和具体研究的拓展,到1990年代,“史学界的多元化格局……形成”^[8]149。与此相适应,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的分化日益显现,并在新世纪呈三足鼎立之势。

就主流史学而言,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形势的进一步变化,学术话语及学风亦进一步转化,从1980年代的“西学热”到1990年代的“国学热”,以前被边缘化的学者,诸如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钱穆、傅斯年等人,其治学方法及治学精神成为人们备加推崇的对象,并占据了学术研究的中心地位。而原来一统天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不断遭受冷落,面临严峻的考验。恰如一些学者所言“如果说1949年后至80年代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历史学的象征的话,90年代的偶像则变为陈寅恪、王国维等‘国学大师’。”^[8]203作为主流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各种史学思潮的冲击下,“正面临、正经历一场比较深刻、比较严峻的合法性危机”^[9]312。以唯物史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历史研究的基本模式的合理性遭到质疑,甚至有人把具有良好学术训练的学者不能在学术上做出更大成就的原因归罪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统天下,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使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走上了歧途。^[10]毋庸置疑,建国以来即居于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尴尬。

与主流史学的命运相反,精英史学的个性正在

凸显。随着史学研究多元化的到来,学界众声鼓噪,喧闹一片,“正在崛起的民间话语、民间学术正在向主流话语、主流学术挑战,争夺资源”^[9]314。精英史学号称不以任何“权威”及任何“书本”的论断为准绳,而是以自己的判断为准则,“不唯上、不唯书、不泥古、不趋时。既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又不作流行观念的牺牲品”^[11]。他们主张百家争鸣、宽容多元,认为“拒斥异见,则必流于武断塞蔽,终使学术枯萎衰竭;众说争鸣,有望走向宽容多元,终使学术健康昌明。”^[12]精英史学的学术评判标准和话语系统与主流史学的差别进一步显现,他们并不认为唯物史观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理论之上的理论,主张在历史研究上,所有有助于解决历史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在地位上都应该是平等的。在这一点上,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吴承明提出的“史无定法”最具有代表性。在吴承明看来,运用任何一种单一模式或单一理论研究历史都不可取,他主张“史无定法”,“不同问题可用不同方法,同一问题也可用多种方法来论证”^[13]。“史无定法”得到罗志田的响应,他“赞同‘史无定法’的主张”,并提出“史无定向”,认为思路 and 视角“定于一”弊端重重,“边界明晰的学族认同原本不是治史的先决条件,我倒倾向于相对宽泛的从各种方向或角度看问题”。^[14]有学者认为“史无定法”祛除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理论或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将它们统统还原为从事历史分析的工具,意义重大,“历史学将有可能从此走向没有意识形态重负的自由之路上”^[8]217。精英史家不仅在理论上张扬学术个性,而且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诸如在文化史、社会史等研究领域,发挥自身特长,展示风格各异的对历史的解释。

就大众史学而言,1990年代的学者普遍使用的是“通俗史学”这一概念,人们重视它的浅显易懂,突出它的普及功能,强调它的阅读对象是广大民众。这一时期,诸多学者开始从学理上对通俗史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探讨,赋予了通俗史学前所未有的价值和意义。更有一些学者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对通俗史学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进一步赋予通俗史学以学科史的地位。所有这些都使通俗史学在理论上获得了与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分庭抗礼的资格。与此同时,通俗史学的创作也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涨局面,尽管在浓重的商业背景下,这些作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甚至出现庸俗化的现象^[15],但它在民众之中的影响却越来越大。进入21世纪以后,大众史学真正由原来的“通俗”走向了“大众”:一是通俗历史读物畅销,成为大众阅读中不可或缺的内

容;二是荧屏推出“电视讲史”,央视《百家讲坛》推出专家对历史的“解读”,在普通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人们可以“倾听”历史,扩大了历史知识的传播;三是随着口述史学的发展,使民众有机会、有可能参与叙述历史、书写历史并表达对历史的看法。^[16]另外,网络的兴起也为大众史学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变成了大众史学传播的另一主流方式,凡是对历史有兴趣的人都可在互联网上发言,网上通俗历史写作出现了写手多、作品多、读者多的“三多”现象。^[17]在过去,历史知识的传播一般要仰赖职业历史学家,而如今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得传播主体向全社会扩大,人人都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做出自己对历史的解读。不仅如此,大众史学还形成了自己对历史的解喻风格,它让人们认识到,“没有下层民众参与和认可的历史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历史,至少是不完全的或不真实的”^[18]。大众史学在历史知识的传播及对民众历史观的影响诸方面,都是主流史学和精英史学望尘莫及并无法取代的。

三

毋庸置疑,不同的史学形态,在历史观、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及对诸多具体历史问题的看法上,会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史学研究中,继续保持一家独尊的局面,还是真正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19]。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种分歧的最终结果是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的相互包容、共生并存。这一方面说明社会对历史知识及历史智慧有着多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说明政治和社会环境较为宽松,有了滋生多种史学形态的土壤,并由此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史学生态。然而,“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必须是批判他们对过去所作的歪曲”^[20],要想保持良好的史学发展态势,三大史学形态的自我反思也必不可少。

在三种史学形态并存的状况下,主流史学的失落感最为强烈。这是因为新中国建立后,主流史学一直一家独尊。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形势及学术风貌的变化,各种史学思潮纷纷崛起,对主流史学的主流地位形成强大冲击,使之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行了总结和反思。戴逸认为,在20世纪,“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指导作用”^[21]。林甘泉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海外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为‘中共官方史

学’,似乎马克思主义史学完全是靠共产党的政治权力扶持起来的,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歪曲。……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首先是由它的科学性所决定的。”^[5]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在新形势下,主流史学必需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诸方面作出调整,自觉迎接挑战。可见“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我们应当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样及时吸收、消化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对于它们的‘合理内核’,我们都应予以利用,而决不可采取轻视、甚至排斥的态度”^[22]。主流史学因为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特征,所以容易受政治风向的挟裹,常常会偏离正常的学术轨道,导致自我迷失和异化。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现象,作为主流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进一步摆脱“标签”式的身份认定,以更加开阔的胸襟迎接各类史学的挑战,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危机,走向新的繁荣。“主流地位不是靠政治的强势,不是靠思想上的强迫,主要靠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学者们自身来努力,通过科学的成果来让人们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5]。

精英史学的崛起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史学界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一大批史学工作者自觉打破理论匮乏、研究模式单一的历史研究局面,致力于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进和利用,不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解释框架。从表面上看,精英史学似乎逐渐疏离作为主流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似乎有意要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保持距离,但是,人们不能忘记新时期精英史学是在主流史学的孕育下产生的。尽管目前精英史学呈百花齐放之势,作为主流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其不再具有笼罩性影响,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传统和治史精神依然在精英史学中延续。唯物史观的自下而上的价值立场、跨学科的治史路数、对历史的贯通性考察等,都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所有历史研究的流派,精英史学自然就在其中。另外,历史研究的生命力源于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作用,精英史家不能仅仅是一个纯学术真理的追求者,还要有更多的社会担当和政治关怀。这种担当和关怀的作用在于剖析社会、唤醒社会和引导社会。

大众史学在中国的孕育、产生和发展不仅是继承传统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是在政治民主和现代媒体发达的情况下,民众有了叙述历史的冲动和表达历史思想的可能,这种可能又与民众参与的主动性、阅读和欣赏的多样化、个性化交互作用,使大众史学无处不在。大众史

学为推动历史知识社会化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固然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不可否认的是,为了某种经济利益或心理需求,大众史学领域出现了不少违背基本历史常识、庸俗、媚俗、故意标新立异等怪现状,内容庸俗、史实讹舛、史观错误的现象比较普遍。^[4]大众史学书写中失范、猎奇现象比较严重,历史绯闻和历史丑闻被反复翻炒,人们对历史和经典的“敬畏感”逐步被消解。有鉴于此,大众史学要想健康发展,必须提高书写者才、学、识、德等各方面的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学习主流史家和精英史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对社会、历史及个人负责,杜绝庸俗,使作品达到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以“良史之心”构建大众史学的体系,阐释人文理念和人文理想,引领社会向善。

参考文献:

- [1] 王记录. 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 瞿林东. 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创新[M]. 求是, 2000 (11).
- [3] 周樑楷. 大众史学的定义和意义[A]. 周樑楷. 人人都是史家: 大众史学论集(第1册)[C]. 台中: 采育出版社, 2004.
- [4] 王记录. 近十年来“通俗历史热”现象探析[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12 (1).
- [5] 林甘泉, 邹兆辰.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历史[J]. 历史教学问题 2006 (3).
- [6] 邹兆辰, 江涓, 邓京力. 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1.
- [7] 王记录. 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误区及其出路[A]. 中国史学会. 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8] 王学典, 陈峰.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9] 王学典. 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 [10] 谢泳. 回到傅斯年[J]. 二十一世纪(香港), 2000, (10).
- [11] 中国文化创刊词[J]. 中国文化, 1990 (创刊号).
- [12] 杨念群. 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 [13] 吴承明. 经济史: 历史观与方法论[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 (3).
- [14] 罗志田. 史无定向: 思想史的社会视角稗说[J]. 开放时代 2003 (5).
- [15] 张晓校. 试论当代史学发展中的通俗史学[J]. 学习与探索, 1997 (1).
- [16] 张广智. 把历史交还给人民——口述史学的复兴及其现代回响[J]. 学术研究 2003 (9).
- [17] 解玺璋. 通俗写史的前途和局限[N]. 人民日报 2009-3-8(12).
- [18] 杨雁斌. 面向大众的历史学[J]. 国外社会科学, 1998, (5).
- [19] 姜义华. 当代中国史学: 从帝王之学走向普遍性的人学[J]. 湖南社会科学 2008 (6).
- [20]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王晴佳, 苏普里娅·穆赫吉. 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21] 戴逸. 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J]. 历史研究, 1998 (6).
- [22] 齐世荣. 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J]. 历史研究, 1994 (1).

The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 the Elit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Public Historiography

WANG Ji-lu

(School of History ,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 Xinxiang , Henan 453007 , China)

Abstrac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s made up of the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 the elit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public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 the development trend shows that the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faces the tests , the elite historiography grows up and the public historiography rises suddenly. To build a more healthy historiographi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 the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should face challenges with more open mind , the elite historiography should show more political concer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 and the public historiography should improve the academic attainmen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s writers.

Key words: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 the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 the elite historiography , the public historiography